

李光耀、约翰·霍华德 为本书亲笔做序
成思危、吴敬琏、张瑞敏 隆重推荐

亚洲的重生

Recreating Asia



Visions for A New Centu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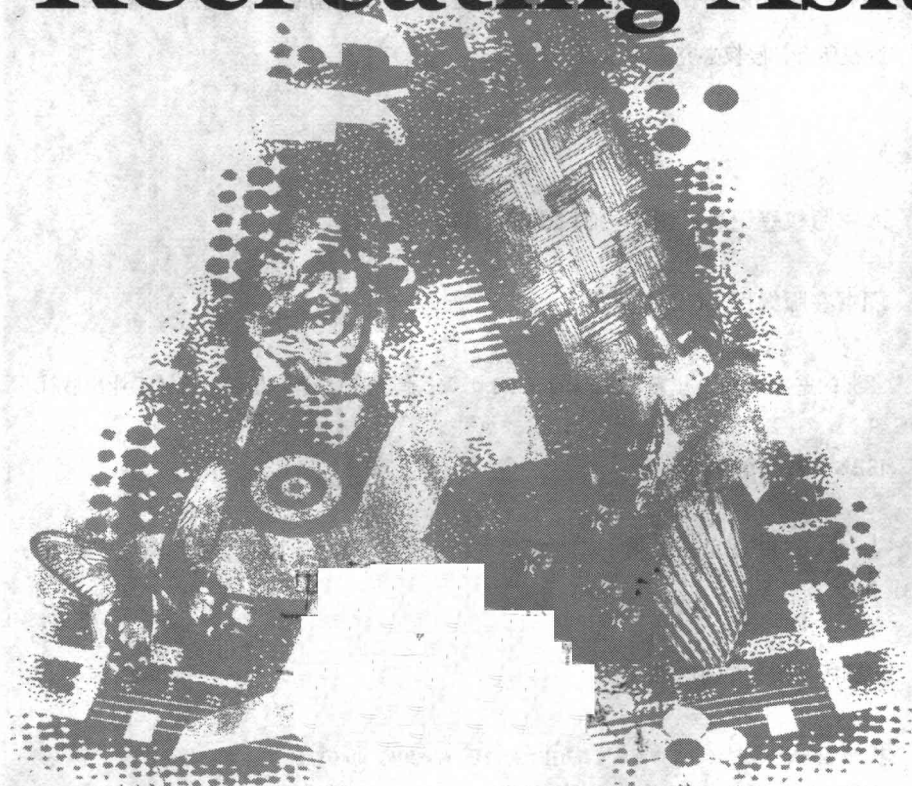
(英) 弗兰克-于尔根·里希特 (Frank-Jürgen Richter) 马家敏 (Pamela Mar) 编 / 傅克华 等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亚洲的重生

Recreating Asia



Visions for A New Century

(英) 弗兰克·于尔根·里希特 (Frank-Jürgen Richter) 马家敏 (Pamela Mar) 编

傅克华 郎平 林季红 译 何帆 审校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Recreating Asia: Visions for A New Century

By Frank-Jürgen Richter and Pamela C.M. Mar

ISBN:0-470-82085-3 (英文版书号)

Copyright © 2000 John Wiley & Sons (Asia) Pte Led

All rights reserved.

© HuaZhang Graphics and Information Co.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John Wiley & Sons (Asia) Pte Led授权机械工业出版社在全球独家出版发行,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版权登记号: 图字: 01-2002-431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洲的重生/(英)里希特(Richter, F.J.)编; 傅克华等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2. 9

ISBN 7-111-10914-7

I. 亚… II. ①里… ②傅… III. 经济发展-研究-东亚-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F131.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68037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责任编辑: 谢小梅 版式设计: 赵俊斌

山东高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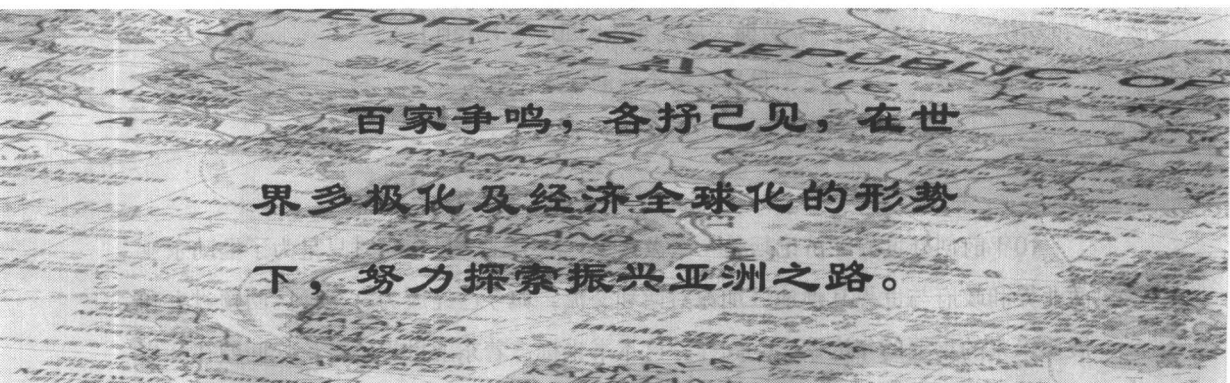
2002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787 mm × 1092 mm 1/16 · 19.25 印张

定 价: 38.00 元(平装)

48.00 元(精装)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百家争鸣，各抒己见，在世界多极化及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努力探索振兴亚洲之路。

2001年，世界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亚洲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其发展态势备受关注。

然而，亚洲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是经济结构单一，过度依赖出口和外资；二是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三是环境问题突出，资源消耗严重；四是地缘政治紧张，地区安全形势复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亚洲各国如何探索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摆在面前的重大课题。

面对挑战，亚洲各国应加强合作，共谋发展。通过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增强亚洲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同时，也要注重内部改革，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成思危

2001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成思危在《人民日报》撰文，就亚洲发展前景提出建议。他指出，亚洲的振兴关键在于加强区域合作，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他呼吁亚洲各国摒弃零和博弈思维，树立合作共赢的理念，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成思危还强调，亚洲的发展离不开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中国愿与亚洲各国一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成思危的论述，为亚洲的振兴之路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亚洲各国应进一步凝聚共识，携手共进，共同开创亚洲更加美好的明天。

前言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主席

10年前创办世界经济论坛是一次极富远见的尝试，尽管当时只是为了推动东亚商业界和政府与世界其他地区加深对话和交流，如今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的重要的年度聚会。同样，这本书也标志着东亚世界经济论坛回顾往昔岁月和展望未来前景的一次契机。它不仅汇聚了2001年香港第10次东亚世界经济高峰会上的突出成果，而且勾勒出这个地区未来10年的重要发展趋势。

作为一个非政府和非赢利性机构，世界经济论坛致力于深化东亚国家间的一体化，以及这个地区与世界在各个方面的一体化进程。我们举办东亚经济高峰会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商业界、政府部门和市民社会领导人之间的经验交流和高层对话，是符合东亚经济和社会发展利益的。

2001年高峰会是自9·11事件以来召开的有商业界、政府部门和市民社会参加的独立的国际会议之一。这次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所带来的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冲击，使得本次高峰会变成了一个就此各抒己见、共同探讨对策的场所。奇怪的是，即使是在经济发展前景不明朗、对安全普遍担忧的背景下，很多与会者仍然认为全球经济形势要比它看起来强大得多，亚洲经济前景也依然很乐观。亚洲经济和企业内部的结构改革终于开始向前迈进了。对全球贸易协作的支持、良好的政治和企业治理以及亚洲在技术和通信产业的领头羊地位，都已经表现得很明朗了。另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中国国内经济的持续增长，为亚洲保持强有力的经济发动机提供了机遇。未来几年中，中国将会对这一地区的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世界经济论坛高峰会之所以闻名，是在于它能够就全球议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坦诚、非正式的讨论，甚至是激烈的争论。这种所谓的“达沃斯精神”，在很多年中

把不同的国家、文化和个人更紧密地团结在一个全球层面上，如今也已演变成一个亚洲现象。我们的成员、参加者和各界朋友的美好愿望，构成了这种精神蓬勃发展的基础。在每一年的东亚经济高峰会上，它都会被再度发扬光大。

在此，我要向马哈蒂尔总理、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总统和所有为本书做出贡献的参与者和朋友表示深深的感谢。我尤其要感谢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邀请我们在香港举办2001年高峰会。我还要感谢李光耀先生和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先生为本书作序。

我们盼望能够同这些以及更多的亚洲领导人、商业界首脑和其他各界的领袖继续合作，以实现我们的共同愿望：经济增长、地区繁荣、社会稳定与和平。

序

李光耀 (Lee Kuan Yew)

新加坡前总理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传统观点认为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然而危机之后，亚洲的辉煌从此也就结束。

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从亚洲各国的发展模式来看，我们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就是这些国家已经从落后的农业国（除日本之外）发展成为工业化国家或者工业化正在实施之中、并且还具有大量对外贸易的国家。但是其他区域的发展却没有跟上该变革的步伐。同时适当的因素也推动了亚洲经济的快速增长：第一，政府维持经济的稳定，实施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创建良好的基础设施。第二，人们对自身再教育，提高自己受教育的水平，努力工作，大部分收入用来储蓄，并对子女加大教育投资。

其中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量外商直接投资（FDI）源源不断地流入到中国。2001年，在亚洲其他国家再次遭受像1997年那样的经济负增长时，而中国经济仍然以7%的速度增长。如果未来10年中国能够继续保持对经济有效和适当的管理，那么中国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对于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地区来讲，未来10~20年，中国仍然是它们的贸易伙伴，而不是它们的竞争对手。中国在产业重新部署、降低成本、改善竞争力、提高利润方面，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一个便宜的基地和巨大的市场。香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就把所有的轻工业转移到广东。目前，台湾地区也正把落后的电子和信息技术产业大批转向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同时，韩国、日本的产业部门也正在做同样的事情。然而中国改善了劳动技能，掌握了技术，提高了研发标准之后，那么中国就不再仅仅是它们的贸易伙伴，而且还会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对手。

对于东南亚各国来讲，中国已经成了这些国家的竞争对手，外商对东南亚和中国的投资，过去通常70%流向东南亚各国，30%流向中国。然而目前该比率正好相反。下一阶段，随着中国逐渐富强，中国更有可能发展成为这些国家的贸易伙伴，进而为热带产品、半成品和境外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随着商品价值链高价值的一端将会出现在日本、中国、韩国和台湾地区，东南亚各国也就成为该价值链的另一端。

在该书中，东亚各国政府、商业以及学术界的杰出领导针对经济发展的可能，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读者可以从了解到世界历史上一次最辉煌的经济社会变革。

序 言

弗兰克-于尔根·里希特 (Frank-Jürgen Richter)

马家敏 (Pamela C.M. Mar)

预测亚洲的趋势是有风险的。首先有大量的亚洲观察家业已存在，而且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这个地区已经经历了很多次似乎预示着变革浪潮到来的“新开始”，但结果却无一例外地消失在挥之不去的类似模式的忧虑之中。市场观察家在寻找股市复苏或外国投资流入增加的信号，但却唯恐出现著名的“死猫”式反弹；政治评论家期盼能发现亚洲国家和企业改变治理方式的迹象，但却生怕旧有的幕后交易和私下贿赂的恶习死灰复燃；社会批评家期待亚洲政府能够解决在他们看来是妨碍亚洲重新获得国际社会尊重的根本性问题，但在探讨这些问题时却要防止被指责为不按“国家利益”行事。看起来，我们大家都在等待亚洲开始一个“新的时代”。

而我们的观点是，亚洲新时代的画卷已经全面展开了，并且在从日常生活，到企业、政府和社会等一系列广泛领域中已经开始起步了。但是，这些发展的轨迹只有在少数时候才可以显现，例如东盟和中国之间或者新加坡和日本之间就贸易框架自由化达成的协议，或者亚洲央行之间的货币互换协议。在大多数时候，它们是很难发现的一些蛛丝马迹。这本论文集旨在向那些能够推动亚洲新时代向前发展的至关重要的人进言。有这样的一些声音“围绕在身边”或者记录在册，我们就可以建议那些预测亚洲趋势的观察家们不要把眼光只停留在过去的历史上，而应该着眼于更紧迫的现实。

在此，我们提出了三个框架，这三个框架放在一起可以说明标志着亚洲重生的最具体的变化。首先，日本虽然依旧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国家，但它却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接近于走出停滞；其次，中国现在是而且将来也仍然是这个地区崛起的一颗

新星，至少在未来5年中会是这样；第三，东南亚国家已经觉醒，并且正在采取行动重新获得竞争力。这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方面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但另一方面却又因为一些看似相反的事实而使之变得模糊不清。

没有哪里可以比日本的情形更清楚了。在过去的10年里，日本始终在国内和国外的信任危机中挣扎。在国内，甚至是日本人民，尤其是年轻人和城市中产阶层，都对现有制度和机构挽救这个国家的能力产生了怀疑，更别提那些被“重组”了的人了。小泉纯一郎受欢迎的程度，以及他在罢免田中真纪子之后支持率的下跌，都足以说明日本人民需要不同的领袖人物。无论人们怎样看待田中女士，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变革，将她从权力中心驱逐出去无疑削弱了小泉现有的权力。幸运的是，小泉能够让另一位有实力、也颇受欢迎（如果不是被狂热追捧的话）的川口顺子就任新外相，从而有可能安全地度过危机。人们非常希望小泉首相能够继续日本的改革进程。

日本是在向上走还是在走下坡路？或许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我们应该问的是：日本是否走出了停滞？如果从报纸或民意测验的结果来看，答案可能是断然的否定。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是如何应对新提议、如何推动新提议的，那么答案就会是肯定的。尽管小泉的确屈服于官僚的压力罢免了田中，但是他的政策——无论是经济还是外交——仍然没有变，仍然以最佳的方式在这两个领域中保持着现实性和魄力。举例来说，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政府开始禁止长期以来阻碍企业重组的企业和金融界交叉持股的现象。另外，金融领域的改革也取得了进展，尽管日本金融改革的设计师竹中平藏始终保持着对外界的沉默。或许，这正说明了事情正在发生着变化。

在企业界，“停滞”一词绝对已经是过去式了。索尼、日本电信电话——多科莫公司、东芝和松下公司只是在日本国内为数众多的，看到了企业的未来，并且知道它存在于海外的蓝筹股中的几个。他们已经送走了可以坐在家中享受好的设计和热情的国内消费者所带来的利益的时代。如今，日本这些企业巨子已经成熟了，在制定新的目标、整合公司业务和确保它们的生存等很多方面要远比政府更加积极主动。最成功的公司要属那些具有自身独特视角的企业，无论这是否意味着亚洲需要超越制造业去创新、去引领信息革命，还是说亚洲企业需要成为更负责任的亚洲公民。

在与亚洲其他国家的企业合作方面，日本的首席执行官们也要比他们的政府更

加积极地去延续这个始于20世纪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时期的传统。那个时候，日本的对外援助比较慷慨，而且和企业的生存紧密相关，这使得日本企业巨子们在东南亚国家获得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现在，我们会发现日本企业的扩张不再是为了获得市场份额，而是为了维持市场地位。也就是说，我们在80年代会发现住友公司会作为承包商、小松作为设备提供商出现在泰国或印度尼西亚的若干建筑项目中，仅仅是为了扩大它们的市场份额，而今天，无论是东芝还是松下向中国的扩张都将是为了使业务向价格更加低廉的地区转移，从而保护他们全球市场地位的一种方式。当然，这些业务最终都将变成商品涌入中国的消费品市场，即使是最乐观的中国观察家的估计都将被证明是保守的。

2001年是中国和美国主导地区和全球地缘政治的一年。在平淡无奇地度过了这一年之后，日本的对外政策在2002年重新恢复了活力。似乎一切都是从企业部门开始，日本在有步骤地积极地向亚洲其他国家示好。这一次，日本承诺的直接援助虽然减少了，但却许诺更多地开放本国市场。后者无疑更有价值。等到日本拆除农产品壁垒的那一天，我们就知道日本的“停滞”时代结束了。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一天会在什么时候到来，当然在现在这一代日本领导人执政期间是不太可能了，但是众多的贸易协议和良好的对外关系却预示着这一天早晚会到来。可能有一天，从停滞中蹒跚走出来的日本政府会让我们大吃一惊。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这一天的出现将在很大程度上间接地归功于中国——亚洲地区崛起的大国。中国的崛起，尤其是2001年上半年中国度过了通货紧缩的难关，让很多对它是否能够超越历史而心存疑虑的人颇为震惊。即使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人们仍然怀疑它是否有能力落实入世协议，兑现当初的承诺。虽然有很多人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势持否定和怀疑态度，但同样也有很多人对此持积极的态度，尽管这个国家的规划者们仍然被很多问题所困扰，从失业到农村的混乱局势、环境恶化，再到财政难题，中国始终有一系列的障碍需要逾越。

有一些人认为中国政府根本不清楚它面临的问题，也有一些人相信中国政府很清楚自己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坚定地属于后者，因为我们看到中国政府领导人在变革面前是如何应对的。他们知道这个国家经历了一段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阶段，他们不是沉湎于对往日成绩的留恋，而是更加坚定了向下一个阶段迈进的决心。不管是引领地区“友谊”（即经济利益的分享），还是让这个国家置身于信息

产业的发展，中国领导人明白，如果他们现在放弃，那么其他的部门——商业团体、人民、媒体，甚至是他们在亚洲的伙伴——都将重新回到充满不信任的自我保护状态中。中国政府得到了来自企业和其他亚洲邻国的高度信任，如果它不再继续努力强化这些联系，他们的支持将会很快消失，同时消失的还有推动这个国家前进的希望。

这里揭示了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现实：虽然经济开放的步伐很快并且市场经济已确立，但中国仍然是一个政府对发展道路有着至高无上权力的国家。这在很多人眼中固然是无所谓的事实，但对国内外那些对经济增长充满强烈期待的商业人士来说却无疑是一个警示。企业运作和投资的框架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以及伴随着地方政府公正、公开进程的推动，已经变得越发的清晰了，但这些进步依然没能改变事实。这些框架仍然在不断地扩大和收缩，有时候甚至以意想不到的、对经济增长不利的方式在变化。这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个从与市场经济完全对立的起点开始的经济不得不经历的阶段。问题的关键是要在繁荣的背后保持清醒的头脑。

中国的崛起在很多方面都给东南亚国家蒙上了一层阴影，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后者没有能力赶上其北方邻国甚至是一半的变革速度。一些人可能会问，如果日本陷入停滞，那么东南亚国家会倒退吗？

在过去10年中，我们看到东南亚国家的大起大落，不仅是经济成就的下滑以及随后的金融危机，而且体现在人们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开放变革的原本很高的期望常常被击得粉碎。在东南亚地区，有好几个国家政府都是以这样反反复复的方式在向更加开放、更加适宜的治理结构转变，有时会推动经济发展，有时则相反。到今天为止，这些国家还没有和过去完全划清界限，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仍然在积极追求和推行着过去的行为方式。有时候，我们或许应该问一下自己：难道我们从亚洲危机中什么也没有学到吗？

尽管这些迹象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显示了东南亚国家在倒退，但是我们仍然认为这个地区正在重新获得其竞争力，虽然全球和地区的种种力量似乎都在和它作对。也就是说，尽管围绕着基地组织和所谓的穆斯林恐怖网络出现了全球混乱，我们仍然可以说，今天，东南亚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和团结。这些国家认识到，他们的竞争力来自于相互合作以确立比较优势和强化地区内部的商业往来，因此，他们在很多领域都加强了合作，例如贸易、货币合作和信息共享。这些合作大多是

在全球恐怖主义活动猖獗的动荡时期进行的，当然其基础早在9·11事件之前就已经打下了。

从地区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快速崛起也推动了东南亚国家重新评估自身竞争态势。南中国海周边国家的部长们不仅加强了合作以弥补地缘上的距离，而且取得了远比过去空泛的“友谊”更大的、更有实质性的进展。中国加入WTO可能会敦促东南亚国家重新评估其北方邻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个地区的形势会得以改善。地区内紧密的商业往来还会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解决那些悬而未决的战略和地缘政治难题，一旦它们再度浮出水面。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南沙群岛问题、台湾海峡问题或者朝鲜半岛问题就不存在了。它们只是暂时隐没，一旦它们重新成为注意力的中心，可以肯定，企业结盟、跨国投资和商业往来构建的新型网络将会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目标的优先级顺序。

经济现实或许是防止在地区力量的博弈中出现轻率或不明智举动的一个保障，而让各国领导人对风险有清醒的认识，有一个详尽的、最好是有远见的长期目标才是更强大的保障。也就是说，那些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才会确保国家行动的公正性。

迹象表明，虽然亚洲国家可能仍将会遇到共同的发展问题和障碍，但是，那些领导人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更加坚持不懈地努力以改变现状。这个地区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举动始于国际市场中心香港和新加坡，如今已经在菲律宾和中国平稳登陆。企业界对此拥护者众，尤其是在那些迄今为止仍然没有找到头脑清醒的管理者的地方（例如印度尼西亚，但并不仅仅是在这一个国家有这样的情况）。重要的是，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那些坚持确立一个以地区基本实力为基础的、有远见的、机会平等的议程的人更多地处于权力的中心，而不是在权力中心之外或是处于反对党的位置。最终，他们会成为推动国家前进的议程的起草者。

目前，安然/安达信丑闻的余波还没有结束，而且它所带来的实际影响可能会需要比几个月更长的时间才能看清楚。在亚洲，我们没有看到一个被指责公司治理太差的地区通常会表示出的幸灾乐祸，而是发现这件事更坚定了他们寻求变革的决心。

当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改革支持者在权力中心有了一个平等的、透明的“比赛场地”的时候，我们还看到权力阶层在迅速地进步，市民社会得到了更多的认可。在正式的国际组织中，无论是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上还是在国际社会建立南南网络方面，亚洲国家表现得空前活跃。基层的市民社会组织也发现它们的观点受到了

XIV

更多的欢迎，甚至成为有关制度如何演变这场讨论的一支主要力量。最终，亚洲国家的这场讨论基础的扩大将对在国家危急时保持灵活性和容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个趋势同样适用于企业界。事实上，商业界人士不再对那些“西方话题”感到陌生，例如良好的治理结构、公司社会责任、平等机会雇佣和以业绩为基础的薪酬和提升制度。虽然愿意提倡这些理念的首席执行官可能还没有多少，但重要的是，那些坚持这些理念的人都是各自领域中的顶尖人物，他们可以成为很多人的榜样。

这些变革制定者们是亚洲新蓝图的一部分，也是它的代表人物。尽管趋势可能会在其发展轨迹中出现逆转或半途而废，但是同样明确的是，这些变革广泛和深入的本质将会强有力地阻止这种逆转的发生。如果方向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期望重生的亚洲会有什么样的特征呢？我们确信亚洲会成为：

- 一个机会平等的地区；
- 拥有头脑清楚的、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
- 具有透明度高的治理框架和稳固的管理制度；
- 经济上高度一体化和自然地融入全球一体化；
- 依然尊重国家传统和文化特性。

这是否是一个过于远大的议程？对他们进行授权是一个方面，而且这早已经完成了。“仅剩”的另一个方面是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能够实现自己的远大目标。

作者简介

马哈蒂尔·宾·穆罕默德 (Mahathir bin Mohamad)

1981年，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就任马来西亚第四任总理。出生于1925年12月20日，毕业于新加坡爱德华国王第七医科大学。1975年，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博士被选为马来西亚国家联合组织的副主席。1978年被选为该机构的代理主席，1981年被任命为主席。1987年再次被选为主席，从此之后，他在马来西亚国家联合组织的领导地位一直没有遭到反对。

戈登·坎贝尔 (Gordon Campbell)

2001年，戈登·坎贝尔就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总理，在此之前，他在该省立法机构工作，官方在野党领导人。连续三届担任温哥华市市长。他在尼日利亚担任教师和篮球、田径教练时，同时还在加拿大大学海外服务机构工作。他毕业于美国达特默思大学，在西蒙弗雷泽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优素福·瓦南迪 (Jusuf Wanandi)

优素福·瓦南迪是雅加达战略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理事会创始人，还是雅加达每日电讯报的出版商和雅加达Prasetiya Mulya管理学院管理委员会主席。他还与许多区域和国际机构有一定的联系，在有关印度尼西亚发展以及区域和国际问题方面，他还是当地、区域和国际报刊杂志的投稿人。

卡里姆·拉斯兰 (Karim Raslan)

卡里姆·拉斯兰是Raslan Loong律师楼的创始合伙人，——马来西亚领先的关于

公司法的法律公司。也是*Ceritalah: Malaysia in Transition and Heroes and Other Stories*的作者。他的每周专栏供美国几家报纸同时发表。卡里姆·拉斯兰毕业于剑桥大学，最近受富尔布赖特奖学金支持，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其中最近的课题就包括“伊斯兰社会的言论自由”。

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 (Gloria Macapagal-Arroyo)

2001年1月20日，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宣誓就职菲律宾第14届总统，是通过“人民-力量”和平变革当选的第二位女总统。她在经济学方面具有一定的教育背景，她的职业生涯是从教师开始，后来成为教授，再后来就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金敏锡 (Kim Min-Seok)

1996年，金敏锡就成为韩国国民议会的一员，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学位。20世纪80年代，作为大学和高等院校国家联合会主席领导民主运动，因此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后来被世界经济论坛评选为未来世界的领导者。

石广生 (Shi Guangsheng)

1998年，石广生就任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部部长，中国加入WTO背后的支持者。在此之前，他曾在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和贸易部担任局长和副部长，也在上海工作过一段时间。此外他还曾在中国国家金属矿产进出口公司、驻比利时大使馆工作。

弗农·埃利斯 (Vernon Ellis)

弗农·埃利斯目前担任埃森哲 (Accenture) 公司国际事务总裁。在公共论坛上，埃利斯先生一直是该公司利益代表的主要角色，与各国政府以及国际上的一些重要

代理机构建立了一定关系。他还担任着威尔士国王国际商业巨头论坛委员会主席；汉城国际商业咨询委员会副主席；世界经济论坛中的国际商业委员会成员。利兹·帕德莫尔（Liz Padmore）是弗农·埃利斯的公司搭档，这篇文章是他们两人合写而成，目前利兹·帕德莫尔担任英国安信哲公司政策与公司事务部总监。

海因里希·冯·皮勒（Heinrich von Pierer）

冯·皮勒博士从1992年就一直担任德国西门子公司董事会主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经济学硕士学位和法律博士学位。他还担任着德国商业亚太委员会主席，世界经济论坛创办委员会成员。西门子公司是世界三大电器电子公司之一，还是欧洲在亚洲的一个最大的投资商。西门子公司仅仅在中国就投资了5亿欧元，创建了50多个公司。

程守宗（John Chen）

程守宗目前担任赛贝斯公司（Sybase）董事会主席、总裁及首席执行官。1997年8月，担任公司总裁兼公司董事，1998年11月担任首席执行官兼董事会主席。在到赛贝斯公司工作之前，程守宗博士担任过the Open Enterprise Computing Division of Siemens Nixdorf总裁。同时在金字塔（Pyramid）技术公司还具有各种行政权力。

傅育宁（Fu Yuning）

傅育宁目前担任中国招商有限公司总裁兼董事，中国国际招商公司总裁，中国商业银行董事会的执行委员会主席。1982年，傅育宁博士毕业于大连科技学院，获得港口航道学学位，在英国布鲁内尔大学获博士学位，后来又在该校做博士后研究。

彭奕伟（Philippe Paillart）

2001年1月，彭奕伟被任命为新加坡发展银行（DBS）首席执行官。在此之前，